

建國初期的國家統治與社會秩序

——評《勝利的困境》

● 胡悦晗



在官方歷史著作中，1950年代初期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恢復、社會和諧的「黃金時期」。但中共已經意識到建立國家統治與社會秩序的艱鉅性。中共必須創建政治制度，實現經濟恢復和增長，進行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並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跟。

周杰榮 (Jeremy Brown)、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編，姚昱等譯：《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關於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歷史，長期以來存在着解釋困境，其表現為史家對這一時期或緘默不語，或

持眾口一詞的教科書觀點。這使得這一時期許多耐人尋味的現象得不到深入探討，僅僅留下臉譜化的簡單印象。體現一場持久革命鬥爭最高成就和爭取民族振興機會的這一勝利，大大地加強了曾經制訂黨的卓有成效的戰略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威^①。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政權易幟與國家再造一片人心所向、歡欣鼓舞的沸騰景象。在官方歷史著作中，1950年代初期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恢復、社會和諧的「黃金時期」。但新政權的締造者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冷靜，他們已經預見到一個襁褓之中的新政權即將面臨的各種困難。1949年7月，距離最高領袖登上天安門城樓不到一百天前，周恩來在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中指出，「原封不動地接收是比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漢，一個城市比一個城市接收得好。進一步來管理就難得多。」^②

周恩來的話預示着兩層含義：第一，中共的城市接管是一個動態變化的複雜過程；第二，「馬上得天下」的中共已經意識到建立國家統治與社會秩序的艱鉅性。中共必須創

建政治制度，實現經濟恢復和增長，進行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並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跟^③。中國儘管很貧窮，但是從1950年代開始，它就有一個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徵，即政府有不同尋常的組織能力，並且能將其政治意志貫徹到最基層，以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④。

近年來，隨着1950年代地方檔案、報告與民間文書等資料的相繼披露，「建國初期」逐漸成為中國當代史領域的研究熱點。海峽兩岸及海外中國學界紛紛涉獵這一領域並陸續推出相應研究成果。由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周杰榮(Jeremy Brown)教授與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教授共同主編的《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於2007年出版，中譯本後於201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勝利的困境》，引用只註頁碼)。該書的問世緣於2004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召開的一次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轉變的學術研討會。書中收錄了來自美國、加拿大多所高校中國研究學者的專題論文，從「城市接管」、「佔領外圍」、「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文化改造)、「家族策略」等幾個視角考察這一混沌初開的歷史時期。

一

中共接管城市的過程是「建國初期」研究的重要問題。儘管近年

來關於城市接管的回憶性史料、檔案彙編及相關研究明顯增多，但如林超超所言，「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局限於政策部署層面的梳理，一者缺少對中共城市政策制訂的內在理路的探究……二者，常理上政策在實際落實中經常會遭遇各種『意外』，……決策者也會視情勢發展在不同程度上調整政策」，故較為深入的動態研究尚不多見^⑤。高崢指出，中共高層在制訂政策過程中的多變性與不確定性為地方幹部在實際執行政策的過程中提供了靈活操作的餘地，地方幹部基於實際情況與自身利益的綜合考慮，常常對政策採取不同程度的變通^⑥。

在《勝利的困境》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與溫奈良(Nara Dillon)分別考察了中共接管上海的過程中，那些以往被忽視的街頭底層人物、被中共視作革命先鋒隊的工人群體，以及上海的慈善團體與新政權的互動關係。出於對舊政權留下隱患的擔心，新政權在悄無聲息進入上海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公開的群眾組織與秘密的情報管道來清理和改造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新舊政權幾十年的動蕩拉鋸使得底層人物為了生存而不斷調整自己的角色與行動，任何人都可能因曾服務於某個組織而成為叛徒或間諜。這些背叛與欺騙的歷史加深了新政權的疑慮與緊張，進而發動了以告密為線索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運動削弱了城市居民之間最為基本的彼此忠誠，讓人們認識了甚麼是「階級鬥爭」(頁52)。

儘管到1950年，上海慈善組織尚有自身一席之地，但隨着鎮反運動的進行，新政權堅決取締慈善組

隨着1950年代地方檔案、報告與民間文書等資料的相繼披露，「建國初期」逐漸成為中國當代史領域的研究熱點。《勝利的困境》一書從「城市接管」、「佔領外圍」、「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家族策略」等幾個視角考察這一混沌初開的歷史時期。

1945至1955年間，中共內部存在兩條路線的衝突：一條路線是親蘇的，另一條則更傾向於本土政策。為了在短期內重建經濟、恢復社會秩序，向蘇聯權威的屈服被認為是必要的。但仍有一些中共幹部對蘇聯駐大連軍事當局的活動感到憤怒。

織，因為這些組織被認定與美帝國主義有各種關聯。從事慈善事業的資本家被迫以各種私人策略向新政權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重新融入新社會。

此外，儘管新政權在野時極力發動激進的勞工運動，但一旦掌權後，新政權對勞工的態度卻與國民黨非常相似——國家必須控制工會和工廠糾察隊。和國民黨一樣，中共從一開始就歡迎那些願意將無產階級利益置於中共國家建設規劃之下的勞工領袖，而排斥那些將工人階級的利益置於最高地位的勞工積極份子（頁11）。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進入急劇轉型的時期，其重要內容之一是領土屬性的「民族國家」化，其中涵蓋了中國疆域的界定、中國同鄰國關係的調整、民族邊疆管理制度的演變、國內民族關係的曲折發展，以及同這些歷史進程緊密相關的「中華民族」的自我定義和認同^⑦。邊疆問題是考察現代中國國家形成的重要視角。林孝庭指出，國民黨政權早期在中國西北邊疆的擴展，以及1940年代在該地區的鞏固發展，意外地為後來中國共產黨接管該地區鋪平了道路^⑧。

在本書中，周杰榮通過考察1950年代中共在西南地區的內戰指出，當人民軍隊遭遇貴州等邊陲地區的強烈抵抗時，新政權在鎮壓反革命的名義下，以最大限度的恐怖手段建立國家統治。當地的男性青壯年被招募參軍，進而被有目的地送往朝鮮戰場的最前線，在那裏喪命（頁12）。

陳兼考察了中共與西藏政治精英在建國初期的緊張關係。當中共由在野黨變為執政黨後，延續了國民黨時期的西藏政策，強調西藏是

新中國的一部分。在藏族人的印象裏，中共接管西藏是漢族人對西藏的接管，這損害了藏漢關係（頁12）。中共領導人從自己是中國各民族解放者的深刻信念出發，實際上改變了對於「民族自決」的態度（頁141）。

高崢指出蘇聯與中共的勢力如何在新疆這一維吾爾族人聚居地區進行此消彼長的滲透，又是如何基於現實利益考慮而攜手合作。蘇聯最初希望在新疆扶持一個聽命於自己的傀儡政權，但由於擔心出現一個獨立、不友好甚至反蘇的新疆，斯大林改變了方針並向毛澤東提供幫助以加快漢族對新疆的接管（頁13）。通過以大量輸送現役漢族士兵及漢族婦女的方式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共成功實現了在新疆的殖民統治（頁202-20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蘇聯在遠東地區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是取得大連和旅順兩個戰略港口。武力攻佔與條約簽訂確保了這一目標的實現。然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出訪莫斯科，提出蘇聯歸還旅大地區、重新簽訂條約的要求時，斯大林完全滿足了中共的要求。根據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後，但不遲於1952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大地區^⑨。何凱思(Christian A. Hess)以大連為例，考察了1945至1955年間中蘇關係的微妙變化。在此期間的大連，儘管中蘇雙方同為社會主義陣營，但兩個國家的基層管理者彼此關係緊張。中共內部存在兩條路線的衝突：一條路線是親蘇的，另一條則更傾向於本土政策（頁178）。為了在短期內重建經濟、恢復社會秩序，向蘇聯權威的屈服被認為是必要的。儘管許多中共幹部對蘇聯人在大連的

行徑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容忍，但仍有一些中共幹部對蘇聯人的行為感到憤怒。一些被派往大連的中共幹部甚至認為，蘇聯駐大連軍事當局的活動是帝國主義的表現(頁166)。當1950年中蘇簽訂新的歷史條約後，雙方關係開始改善。中蘇友好協會及青少年夏令營等一系列旨在促進中蘇關係的活動得到大力推廣。通過將大連塑造成一個「中—蘇」城市，有助於將大連整合進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頁184)。

迄今為止，對1950年代共和國文化的研究大多聚焦於意識形態，並把這段時期的文化改造處理成通往文革之路的過渡時期。這一研究導向因強調文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而忽略了其社會性^⑩。該書中，幾位學者以相聲、人類起源、影視業及教育界為個案，從不同角度考察了建國初期的文化改造。

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儘管相聲藝術家極力以「進步」的民族藝術改造相聲表演形式，但以諷刺與批判社會現實達到逗樂效果的相聲表演，難以符合希望正面宣傳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化官員的要求(頁236-40)。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發現，在關於人類起源的問題上，新政權利用以恩格斯理論為基礎的「勞動創造人」學說攻擊了天主教徒傳播的上帝造人說。然而，從中國的科學家堅持認為北京猿人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這一點上，可以發現隱藏其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頁255-59)。

畢克偉以內戰時期成名的電影人石揮在建國初期的個人經歷為例，考察了建國初期電影界的動蕩局面。隨着國家對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政治恐怖與自我審查帶來的

緊張使每一個人基於生存的需要都面臨背叛與出賣的困境(頁274-99)。

李濱(Douglas A. Stiffler)指出，1950年興建的中國人民大學由中方與蘇聯專家共同組建。由於來自農村老區的革命幹部教育水平較低，旨在訓練大批「新式」知識份子的中方管理者堅持從各個階層中招生。這種方式不僅與持激進態度的蘇聯專家的理念產生衝突，也製造了學生群體內部「青年知識份子」與「老幹部」之間的衝突。在中蘇關係交惡的外部因素下，精英主義與技術官僚主義遭到批判，毛時代的「老幹部」獲得政治優勢，迎接「青年知識份子」的是一個黑暗時代的到來(頁315-19)。

歷史學家對於傳統家庭的研究，長期以來流於一般史料的羅列，論著一般以史料鋪陳為特點，所提出的問題多與宗族制度、婚姻制度聯繫在一起；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家庭問題的關注大多從現實問題出發，而對歷史時期的家庭演變只有很概括的敘述^⑪。對於作為研究對象的家庭史本身具有甚麼樣的內在邏輯結構，以及應如何從家庭史本身的內在邏輯結構出發開展探索，似乎尚未予以足夠的注意^⑫。在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看來，家庭史的寫作應當「把個人肖像放入複雜的中國歷史中，去捕捉這個中國家庭在各個關鍵的政治動蕩與社會劇變時期的生活經驗」^⑬。

在本書中，周錫瑞考察了一個晚清地方精英家庭葉氏在共和國初期的生活史。葉氏家族成員的命運在民國時期隨着政治對私人生活的滲透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9年後，葉氏後代各個家庭的命運因為其服務角色的不同而同途殊歸。儘管1950年代初期是一段充滿快樂記

對1950年代共和國文化的研究大多聚焦於意識形態。這一研究導向因強調文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而忽略了其社會性。書中幾位學者以相聲、人類起源、影視業及教育界為個案，從不同角度考察了建國初期的文化改造。

當代中國(即1949年以來)社會變遷至少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或內容，即圍繞着「現代化」和「社會主義」而發生的變遷過程；要更準確地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必須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考察。

憶的好時光，但政治已經開始漸漸涉足家庭生活(頁348)。

賀蕭(Gail Hershatter)指出，對遍布中國農村的成千上萬的舊式接生婆，中共採取了靈活的策略：一方面譴責不衛生的接生活動，另一方面由地方婦女組織出面，訓練新式助產護士並重新培訓舊式接生婆(頁351-69)。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通過考察上海著名實業家劉鴻生1949年後的命運顯示出，出於保存一個家族整體的強烈願望，儘管劉鴻生對新政權心生疑慮，但他仍然留在大陸，並極力動員劉家所有成員返回大陸(頁396-97)。然而，儘管這個家族完整地留在大陸並擁護新政權對工商業執行的政策，但並未逃脫隨後的政治洗劫，進而在1953年的國有化運動中喪失了所有企業。

二

本書作者各不相同的研究視角與對象為我們展現出共和國初期空前強大的新政權向政治、經濟、社會、文教各個領域全面滲透的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儘管新政權尚且面臨正統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內部衝突，其伸向社會每個角落的觸角也偶有不及之處，但新政權已經開始通過對個體命運的介入與主宰建立起不容置疑的絕對威嚴。個體迎來的不再是平靜、祥和、可以預期的未來，而是種種不確知的懼怕與恐慌。這種緊張的時代氛圍銷蝕了社會的道德與信任基礎，為隨後而來的野蠻行徑與政治清洗鋪平了道路。

然而，關於建國初期歷史的考察還有許多有待發掘之處。首先，

舊政權崩潰的前夜，新政權的地下工作者搜羅並編寫了許多他們將要接管的城市的簡介、圖冊等資料，然而來自根據地的「老革命」們並不歡迎他們過多參與新政權的建設。在以革命資歷為日後職務升遷的重要依據的中共黨內，這兩個群體有着農村與城市的不同經驗，他們如何理解即將面臨改頭換面的城市？隨着中共解放城市時間的不同，中共的政策制訂者與基層執行者都具有了更多前車之鑒，從而為如何接管下一個城市打下鋪墊。以時間先後為序，縱向考察中共接管城市的政策與執行兩方面呈現出的差異，是了解此一時期城市接管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其次，易代之際，每一個個體都面臨主動與被動的命運選擇。舊政權時期的文人墨客以各種百態世相迎拒新政權的到來。人們通常把1949年後的知識份子精英視為一個受壓抑的整體，而忽略了或遮蔽了其中的複雜性^④。1950年代的政治與文化生產機制為日後半世紀的文學與文化留下深遠的影響。進入新政權的龐大體制、進而掌握了學術與文化資本的專家學者對昔日的並肩好友施以無形的壓制與排擠，從內部改變了知識群體的生存處境。知識份子個體命運的變遷沉浮在1949年後的巨大差異，既有外在政治環境的決定性因素，亦有知識群體內部的誘導性因素。箇中原因與複雜性值得深入探究。

當代中國(即1949年以來)社會變遷至少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或內容，即圍繞着「現代化」這個方面而發生的變遷過程和圍繞着「社會主義」這個方面而發生的變遷過程；要更準確地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過程，必須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考察才有可能^⑥。1980年代以來，當中國大陸學者開始摒棄革命意識形態的窠臼，用現代化理論考察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與走向之時，海外學者則透過政治意識形態的透鏡，探究「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中國特色。前者希望以國際化前沿理論改頭換面的方式遠離政治，後者則視政治意識形態為理解現代中國革命進程的核心所在。而晚近關於建國初期歷史研究所展現的混沌未分的時代場景，已經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作用下，海內外學者的研究在問題意識、研究視角與研究對象等方面開始具有更多的疊合之處。這些疊合之處成為中西學者日後在該領域進一步展開對話的基礎。

註釋

- ① 參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57。
- ② 周恩來：〈恢復生產，建設中國〉，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89。
- ③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著，胡國成、趙梅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97。
- ④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方慧容譯：〈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中國的社會變遷〉，載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19。
- ⑤ 林超超：〈中共對城市的接管與改造——一個初步的研究回顧

與思考〉，載韓鋼主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151。

⑥ 參見胡悅晗：〈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春／夏季號，頁179-86。

⑦ 劉曉原著，胡悅晗譯：〈邊疆中國和1949年〉，載韓鋼主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三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117。

⑧ Hsiao-ting Lin,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5, no. 1 (2007): 115-35.

⑨ 肖瑜：〈試論中蘇關係中的旅大問題(1945-1955)〉，《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頁51。

⑩ 姜進：〈斷裂與延續：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頁96。

⑪ 張國剛：〈如何撰寫中國家庭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頁163。

⑫ 王利華：〈中國家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述評〉，《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186。

⑬ Joseph W. Esherick, preface to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xii-xiii.

⑭ 錢理群：〈1949年後的沈從文〉，載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當代文學六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頁132。

⑮ 謝立中：〈理解當代中國：兩種不同的理論視角〉，載《社會理論：反思與重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323。